

走近孵化器系列报道(一)

“飞快的”孵化器应该“沉”下来

■傅利 本报记者 杨琪



尽管我国孵化器起步晚,发展速度却快,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

观点

带着一台 mini iPad,创业者胥克谦在北京中关村车库咖啡开始了一天的“办公”。虽然并非每日必到车库咖啡,但这里却是胥克谦创业起步的大本营。

1年多前,他带着“将专业的动画变成普通人的表达工具”的梦想来到车库咖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胥克谦与诸多创业者、投资人和车库咖啡的老板苏菂不断交流。“正是这些批评和建议,促使我找到了更为合理的商业模式,不断校正我们的创业路径。”胥克谦笑着说,“这样的‘挨批’很幸福。”

看到“被批评人”一脸幸福,车库咖啡创始人苏菂也会心地笑了起来。他得知,经过1年多的研发,胥克谦的皮影客系列动画云服务产品即将发布,3月7日,皮影客拿到了营业执照。

在中关村,类似胥克谦这样的草根创业者数以千计;在北京,类似车库咖啡这样的新型孵化器不断涌现,如3W咖啡、云基地、天使汇、36氪等。

其实,这只是我国孵化器大军中的冰山一角。“经过26年发展,尽管我国孵化器起步晚,却发展迅速,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已达到世界第一。”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孵化器管理处处长、高级工程师陈晴说。

高速成长

今年6月,3W咖啡将在北京海图图书城步行街开设第三家分店。

2011年8月,3W咖啡在中关村西区的立方庭写字楼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纯属无心插柳,我们并没有想到3W咖啡会逐渐演变为一家互联网创业孵化器。”3W咖啡联合创始人鲍春华说。

3W汇集了近200名互联网企业高管,他们是3W咖啡的股东,也是中国互联网的领袖人物。

现在,3W咖啡聚集了200多位互联网高管,他们是3W咖啡的股东,也是中国互联网的领袖人物。“我们还运营了‘3W专家俱乐部’,俱乐部里面的人都是互联网公司中的优秀人才,他们是潜在的优质创业人群。”鲍春华说。面对这样的一群“资深、高学历、人脉广”的潜在创业者,3W咖啡会对其中的优秀选手给予更多资源,助其创业。

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关村孵化器正在形成创业服务新业态,呈现出创办主体多元化、运营模式市场化、孵化链条向早期阶段延伸、专业服务向多样化发展等趋势。

“孵化器是创新驱动的标志之一,其用最小的空间,场地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聚集了一批最具创新活力的创业者,这也成为城市创新活力的标志之一。”陈晴说。

陈晴表示,我国孵化器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孵化器数量为1034家;孵化面积达到340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为6万多家,累计毕业4万家企业。

仅在2012年,武汉市新增孵化器面积就为200万平方米,累计面积已达到500万平方米。“随着国家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各地对孵化器重视程度不断加大。”陈晴说。

不足与不均

“尽管孵化器发展步伐飞快,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孵化器依然存在不少问题。”陈晴说。

今年1月发布的《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二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孵化器发展规划”)提

到,目前,我国孵化器的服务水平尚有以下环节的缺失:支持孵化器和创业企业的政策环境尚待健全;整体数量和质量尚难满足不断增长的科技创业需求等。

“2007年,国家对孵化器财税政策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效果并不如人意。有些政策难以落实,有些政策门槛太高,同时征管程序也比较复杂。”陈晴说。

另外,从国家层面来看,对孵化器的专项资金支持并未完全落实,更多的是来自地方层面的专项资金支持。“目前,在火炬计划中能够为孵化器提供部分支持经费,而创新基金更多用来支持企业前期研发和后期产业化。”陈晴表示,大部分基金依然分配给了比较成熟的创业企业。

因此,对一些在孵化器中的草根创业者、原始创业者而言,无论是来自政府的、天使投资的,还是投公司等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凸显不足。“个别园区做得比较好,但是社会资本的关注度依然很弱。”她说。

此外,尽管北京、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对孵化器愈发重视,其他一些欠发达地区却依然未引起重视,不少高新区在招商引资方面依然走要素驱动为主的老路。

“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质量上,现有的孵化器依然不能满足创新创业的需求,也不能达到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陈晴说。

国外专家的研究显示,在一个国家或某座城市,其孵化器数量与人口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可反映该国或地区的创新成果,这一比例为:100

万人口应拥有5~7个孵化器。

按照如此比例,目前我国有13亿人口,孵化器数量应为6000~9000家。实际上,我国孵化器数量还未达到这一水平。

不过,国内一部分省市的孵化器数量开始逐渐向这一比例靠近。

陈晴考察发现,最近几年,江苏省每个县都拥有孵化器,甚至乡镇一级也出现了孵化器。目前,该省共拥有孵化器400余家,按照该省8000多万的总人口数,基本可达到以上比例。

“而中西部省市与此差距却很大。有的西部一个省总人口数达到几千万,但是孵化器只有几千个。”陈晴说。

应更注重质量提升

孵化器发展规划中还提出,目前我国孵化器对创业企业整体服务能力和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创新,链接与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

陈晴说,尤其与发达国家孵化器的服务水平相比,如美国硅谷、法国、以色列等,我国孵化器差距较大。

她认为,这与我国孵化器经历的发展阶段有关。在早期,我国孵化器多由政府投资、提供场所,为企业提供简单的事务性服务,但是深层次的专业化服务能力非常有限。

“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孵化器将向深层次、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的方向推进。”她说。

截至2011年底,我国国家级孵化器为380家,其中事业单位为197家,企业性为183家,大多数为国营性质,民营孵化器目前能达到20%左右。

“因为利益未与在孵企业捆绑,一些孵化器团队缺乏激励机制。”陈晴说。

反之,创新工场虽然对项目进行严格筛选,但是能够进入的项目都可获得来自创新工场的投资,双方的“命运”紧紧相连,激发更足的创业动力。

这样的运营方式正是目前国外孵化器多采用的模式,通过投资企业获得回报,并非依靠简单的服务来赚取利润。

而在我国,因为受体制机制限制,不少孵化器无法投资在孵企业。作为主管部门,火炬中心近年来一直鼓励孵化器建设自己的孵化基金,但是不少地方更多考虑风险因素,投入力度并不大。

相反,在一些民营孵化器中,团队投资在孵化器后,吸引了社会资本进入。

据中关村管委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创新工场、车库咖啡和常青藤创业园3家创新型孵化器孵化了早期项目120个,企业平均在孵时间为6~12个月,68个项目获得早期投资,4个被并购,孵化成功率高达60%。

截至目前,我国孵化器累计培养上市企业达160余家,“但不少企业都与原来的孵化器关系不大,有的企业长大就飞走了,导致当地税源流失,从而影响了地方发展孵化器的积极性。”陈晴说。

因此,在“十二五”期间,作为指导单位,火炬中心将逐步引导孵化器不断转变,完善孵化器环境,提升发展水平。

近年来我国的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科研能力显著提升,但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转化的问题却愈加突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力军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很多科研院所转制后,成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很难为行业企业提供公平的科技服务。另外,高校的科技人才集中,研发基础不断夯实,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中的作用越发显现。

那么,新时期,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究竟出现了哪些新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才能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坐实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新时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具备哪些新特点。

进入21世纪,全球竞争进入“产业链竞争、创新资源竞争”的深化时期,带给科技成果转化崭新且长远的影响,使得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展现出“竞争”的时代特征。

科技成果转化,在过去突出大学、科研院所等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基本面上,更加强调知识购买或转让形成垄断,强调研发外包形成知识链竞争,强调知识价值转化的市场效率远远胜于研究成果自身的创新性,美国高智发明的崛起就是典型案例。

科技成果转化进入“竞争时代”,给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带来新要求,速度至上,使得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强调协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转化机制与政策创新尤为重要。自主创新重要,如何实现自主创新带来的成果,收益更重要。

再来看看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矛盾或关键性问题。

这里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科技成果受让主体面临“需求与能力相矛盾”的尴尬。

我们知道,企业应该是科技成果接受的主体,中国民营企业也有科技成果需求的欲望,但是,受制于经济规模和发展实力,企业缺乏科技成果接受的能力。而各类国有大企业恰好相反,虽有科技成果接受能力,却缺乏接受的欲望。其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足1%,就是最好的例证。

另外,指导科技成果转化的理念意识相对落后。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的对象,更多强调的是“已经完成的成果,尤其是研发形成的成果”,而对“科技成果研发过程中的知识溢出”缺乏重视。

我认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缺乏研发过程中知识学习、知识传播,包括人员交流、信息交流等,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问题之一。

那么,地方如何从制度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呢?

首先,我们应该认真深入研究科技成果转化进入“全球竞争时期”后,如何从获取竞争力的角度,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项研究,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的重要支撑。

很多人把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拜杜法”作为学习对象,甚至奉为“圣经”。而我认为,应该把现在转化对象强调“已经形成的成果”,上升到“科技成果研发中的知识传播”,甚至将“把研发及成果转化全过程中如何加快知识传播的速度”,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的主线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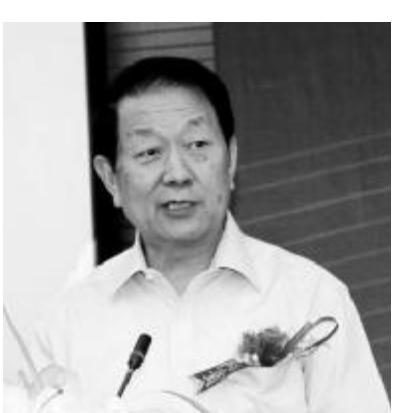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刘会武

如何应对新时期科技成果成果转化难题

程津培:高新区企业应加大基础研究

■傅利



程津培

“过去10年,我国高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新区的工业企业R&D投入已占到全国工业领域的35%,专利授权数量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目前,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科技部原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程津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肯定了高新区和园区内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作出的成绩。

但程津培更加强调,高新区仍然出现创新驱动不足的现象,如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和可形成支柱产业的创新成果不足等。“高新区要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更需要强调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责任,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企业的能动性。”他说。

缺乏世界级创新企业

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是国家对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要求。”程津培表示。

“由于我们对于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重视不够,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机制不完善,使得我国没有产生创新驱动的世界级影响的企业。”程津培遗憾地说,在不断强调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同时,却没有一家中国公司在相关世界级评选中上榜。

如世界公认的汤森路透全球创新力企业(机构)百强评选。在其最近的百强名单中,共有47家美国企业、32家亚洲企业和21家欧洲企业上榜。虽然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已领先全球,但由于专利质量及成果转化不足,在最近两年的百强榜单中,无一中国公司上榜。

中国的论文数量、专利的申请量已居世界前列,论文引用率也在不断提高,但万人平均专

平均水平。

在我国,大中型企业建立研发中心的仅占27.6%,平均每家企业的研发人员只有89人。而世界500强企业中,470家在华建立了研发中心,研发人员少则几百人,多则数千人。

我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企业总是希望用最少的投入解决最关键的问题,但如果完全不作基础研究,怎么可能在众多因素中识别并提出最关键、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呢?如果将科研创新都寄托在科研机构身上,就像家长不知道自己孩子问题出在哪里,总指望心理咨询机构解决问题一样。那么,解决问题就只能靠测试、靠排查,怎能有效率?”程津培说,“所以,有历史责任感的创新型企业,必须有选择地建立自己的基础研究,一方面可以提高与科研人员对话的针对性,掌握产学研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基础研究带动持续的技术创新,掌握企业未来的命运。”

现在,有些企业将加强产学研结合的责任主体看成是科研机构,这是本末倒置。他强调企业要加强在产学研结合方面统筹布局的能力。

程津培说,目前很多企业都希望从研发机构拿来自项目直接就能生产,不然就需要科研机构项目负责人,甚至整个研发团队长期跟进项目,而企业自身却完全缺乏“二次研发”的能力。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尽管也有为企业服务的意愿,但如果其成果无法转化成实际效益,则可能失去为企业服务的热情。

“国际上,甚至有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项目是来自企业的。但在我国,即使像华为这样的高技术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也只有1%,远远达不到国际创新型企业的标准。”程津培说。

据相关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只有0.93%,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

地方财政和企业支持基础研究有待提高

充足的资金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催化剂。

“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做得好?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支持基础研究,而且投入力度相当之大。但我国很多地方政府更愿意将钱投在能迅速看到成效的地方,企业更是缺少基础研究意识,以为基础研究完全是中央政府的事。这是鼠目寸光。”程津培说。

近年来,中央财政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增量明显,去年全国的R&D投入已过万亿元,但在R&D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比重常年徘徊在百分之五左右。而世界上的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的比例约占研发投入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目前,我们地方政府主要关注应用研究,在财政比较紧的情况下,基础研究多被舍弃,只有少数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还保留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企业方面,目前我国企业R&D投入已经占到R&D总投入的74%,而基础研究的投入几乎为零。

因此,程津培认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不能只看中央财政。未来,加大基础研发投入的潜力,可能主要是来源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韩国都走过模仿为主的路子,他们把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控制在百分之十左右,目的是省出更多的经费用于跟踪性应用研究。但后来他们都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看到跟踪是跟不出强国的。现在,韩国用在基础研究的投入已占到其R&D总投入的15%,日本也在努力向15%以上的目标提升。”程津培强调,“只有加强基础研究,才能降低我们经济发展中的对外依存度,企业也才能看到创新带来的真正效益。”

■数字

10%

日前,广东省珠海市4家企业入选2011~2012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名单。这些企业包括远光软件、东信和平、世纪鼎利和炬力集成,炬力集成公司成为广东省首家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本次认定全国共有240家企业入选,其中广东省有18家企业入选。通过该认定的软件企业,可享受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待遇等。

70

亿元

近日,西安高新区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高端存储芯片项目,主厂房及附属建筑桩基处理已全部完成。该项目一期投资70亿美元,是国内最大外商投资项目,于去年9月开工。

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基础工程、PC工程施工,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也在积极推进。预计,一期项目投资达产后,可形成660亿元人民币的年销售收入,聚集160余家配套企业入驻园区。

112.9%

安徽省知识产权局公布了今年1月该省各市、县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其中,合肥高新区1月份专利申请量达347件,核心指标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50件,同比增长112.9%;专利授权量达到202件,同比增长51.88%,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实现开门红。据悉,合肥高新区去年专利申请为2605件,授权2344件,居全省第一。(贡晓丽整理)